

2505

重刊
堂頌

89

巧家縣文史資料

第一輯



巧家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 任：张承殷

副 主 任：郑家焯

委 员：廖开元 罗启昆

许定敏 王恩惠

雷光清

主 编：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组

校 对：张世安

封面设计：徐荣灿

封面题字：王森祥

前 言

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是周恩来同志一九五九年倡导开展起来的；是人民政协的主要工作之一；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此，政协巧家县第二届委员会把征集、撰写文史资料，列为本届政协工作的重点项目。我们的计划是：本辑着重于专门抢救、收集、整理、编写巧家县解放前的有关重要文史资料。因张承殷副主席解放前历任巧家县立中、小学校长、民众教育馆长、县参议会议长、县教育局长等职；解放后又担任巧家县人民政府文教科长兼巧家中学校长；是现在我县健在的比较知情的三亲人士之一。故本会特委托张副主席为本辑文史资料的征集、查证、整理、编写等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但我们因缺乏经验，水平有限，兼之表达能力和工作条件差；在所写文史资料中难免在某些方面可能不大准确，甚至错误，或词不达意之处。故先将第一辑初稿陆续印发，分送各机关单位和政协各位委员多方征求意见；并请亲历者及知情人士补充、指正、提出批评意见后，再次定稿付印。

一九八九年五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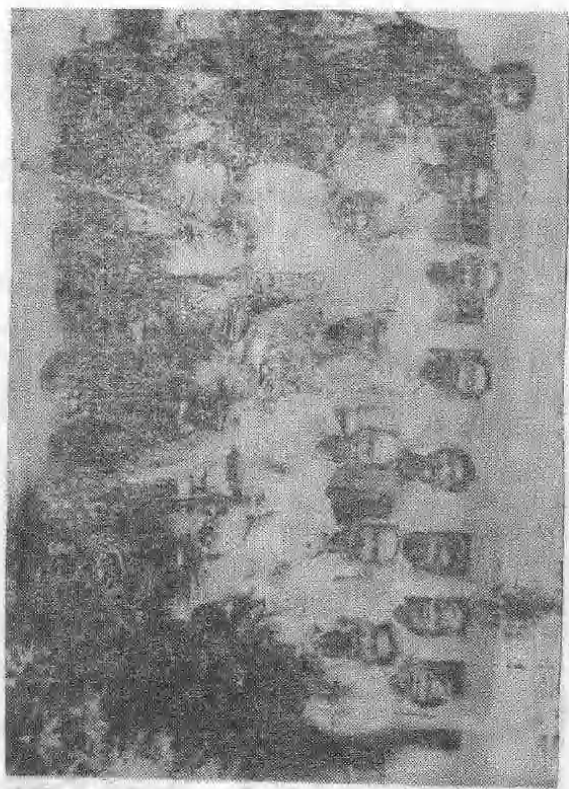


图2 戚协巧家委员会第一届常委会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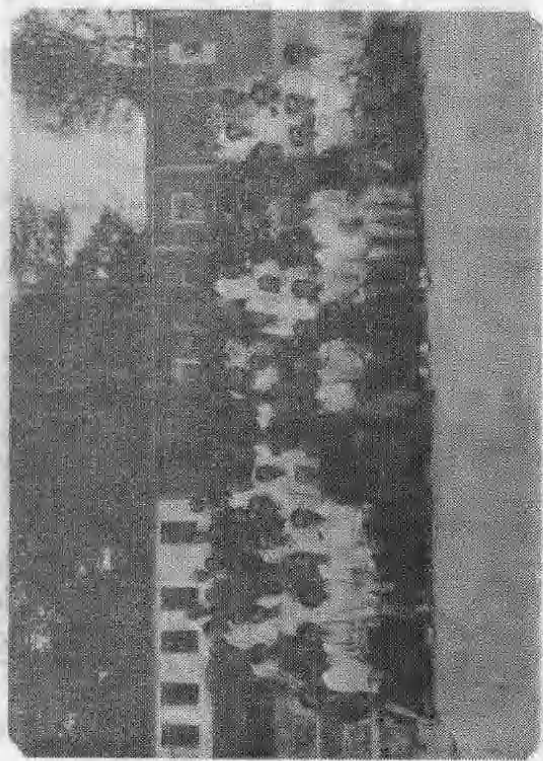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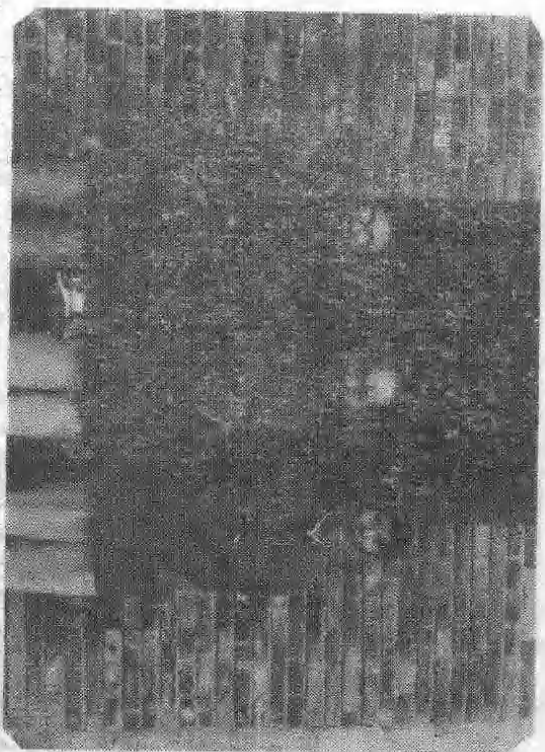


图8 政协巧家县委员会第二届一次全委会合影

三人在旧校舍大门前合影

右：政协副主席冯恒芳（现任巧一中校长）



左：政协副主席张手殿（解放前和五〇年曾任崇仁中学校长）

中：政协常委郑家煌（解放前曾任崇仁中学校长，解放后任巧一中党支部书记）

目 录

前言

巧家县历史沿革·····	张承殷 (1)
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二十年的张开儒·····	张承殷 (1 3)
清末霄品三反卡暴动起义经过·····	张承殷 (2 1)
巧家县解放前县团级以上人员简历·····	张承殷 (2 7)
巧家县解放前大、专、院校毕业生简介·····	张承殷 (3 0)
巧家县解放前教育概况·····	张承殷 (3 3)
巧家县民国廿八年 (1939年) 至卅 九年 (1950年) 大事记·····	张承殷 (6 0)
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进入滇东北地 区后从巧家 (米粮坝) 渡过金沙江入 川的考证·····	张承殷 (7 5)
有关诸葛亮平南 “五月渡泸” 的史 料汇编·····	张承殷 (8 2)
县长龙沛霖弃城逃跑与议长卢开基 被绑架毙命经过·····	张承殷 (8 9)
解放前巧家县城附近群众的抗税 斗争·····	张承殷 (9 7)

解放前云南人企公司巧家县应分享

股红息的概况……………张承殷（100）

政协巧家县委员会第一、二届委员姓名录…（104）

巧家县历史沿革

张承殷

县名的由来：根据民国九年（1920年）《云南省巧家县地志调查资料》记载：“巧家”二字，系初开辟时一夷酋之名，近城一带是他的领地，其人死后，即以此二字名其领土。另说：“巧家”二字，系初开辟时，巧家的夷族首领“曲古都家”的简称，经演变后译音定名“巧家”，并志参考。

根据《巧家县志稿》记载：西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置堂狼县，属犍为郡，是为巧家建治之始。

公元前250年秦孝文王时，李冰任蜀郡太守，即开始由今四川宜宾地区沿江开山凿岩，修筑通往滇东北地区的道路，史称犍道。到了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进一步通往云南，他派遣常頌继续修筑这条道路，常頌把李冰原来修筑的犍道向前延伸。经朱提至建宁（今昭通至曲靖）全长二千余里，由于道宽五尺，故史称“五尺道”。五尺道修通后，秦派遣官吏对西南夷的一些部落进行了直接的统治。四川的商人也把铁农具沿五尺道不断输入西南夷地区，对促

进滇东北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秦亡以后，西汉王朝对西南夷的统治，曾一度中断，但到了汉武帝刘彻时代，经济、文化都极发达。当时“西南夷”地区的各族人民与四川商人的交往也日益频繁，四川出产的盐、铁器、土布等已成为西南夷地区各族人民不可缺少的商品。因此，在西南夷地区设置郡县已是西汉王朝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汉武帝乃于建元六年，派唐蒙为中郎将，通西南夷，设置了犍为郡。唐蒙率领士卒千人，后勤部队万余人，发巴、蜀卒治道，在五尺道的基础上，将道路扩宽丈余，史书上称这条道路为“南夷道”。在修筑南夷道期间，设置了朱提（今云南昭通）、堂狼（今会泽、巧家、东川市）、郡鄯（今宣威）、南广（今镇雄、奕良、威信）、汉阳（今贵州威宁）五县，属犍为郡，是为巧家建治之始。汉武帝置郡县后，即在南夷地区移民屯田。掌握了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的汉族人民，大量南移，使西南夷地区的经济、文化得到了发展。这些汉族移民，就是后来的“南中大姓”的一部，这说明了汉武帝在西南夷地区设置郡县、移民屯田，对边疆的开发起了积极作用。

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置三绛县，属越嶲郡。
东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仍置堂狼县，属犍为属国都尉。

汉代所谓的“属国”，是“分县治民比郡”，“似郡差小”，即在郡中又立一小郡。其统治对象是被征服或强迫迁徙的少数部族。根据《后汉书·郡国志》的记载：东汉光武

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这时的犍为属国有7938户37187丁口。它的范围，包括今天的昭通、鲁甸、巧家、会泽、和贵州的威宁、赫章等地。东汉时期是犍为属国经济文化空前发达的时期。如前所述，由于汉族移民的大量涌入，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文化知识，水稻种植和冶铜技术都比较发达。堂狼县是冶铜中心，这里生产铜器，已行销外地，铸有“朱提”“堂狼”款识的“双鱼洗”更著称于世。

东汉献帝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刘备改犍为属国为朱提郡，以邓方为太守。这时的朱提郡属县有五：即朱提、堂狼、南秦（今贵州赫章）、汉阳（今贵州威宁）、南昌（今云南镇雄）。当时蜀国把今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称为“南中”，在“南中”设庾降都督，管理南中七郡。

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282年）置朱提郡，领有朱提、南广、汉阳、南秦、堂狼五县。

晋惠帝太安二年，李雄在成都称帝，国号“成”，史称“成汉”，成汉政权占领朱提计八年。

晋惠帝时，巴族人李特随关西六郡氏叟青羌居民十余万人，流入蜀地求食。朝廷强迫流民限期归还本乡，晋官吏暴力逼迫，并在路上设关，夺取流民的财物。李特在四川绵竹为流民推作首领，设大营收容流民，不到一月聚众至二万，李特弟也聚众数千人。公元303年李特攻入成都城西郊，被晋平西将军益州刺史罗尚袭杀，其子李雄继领部众，于公元304年攻取成都占领益州，自称成都王。公元306年李雄自称

皇帝，国号“成”，史称“成汉”。据旧《云南通志》记载：朱提西南二百里有望狼山，晋太安二年（注：应为太安二年）威将李骧等侵越嵩，宁州刺史王逊遣将军姚崇击之，战于堂狼，骧军大败，姚崇追之至泸水。又据《晋书·王逊传》载：先是越嵩太守李钊为李雄所执，自蜀逃归，复以钊为越嵩太守。李雄遣李骧仍回攻钊，钊自南秦与汉嘉太守王载共拒之，战于温水，钊败，载以二郡附雄。后骧等又渡泸水寇宁州，逊遣将军姚崇、爨琛拒之，战于堂狼，大破骧军，崇追至泸水，赴水死者千余人。晋成帝咸和七年（公元332年）李雄派李寿攻宁州至朱提。太守董炳闭城固守，宁州刺史尹奉派遣宁太守霍彪，大姓爨琛增援董炳，但朱提是座孤城，粮耗缺乏，守到八年春正月，晋将董炳、霍彪、爨琛只好开城投降，朱提遂为“成汉”占有。自公元332年至339年，其间成汉政权占领朱提共八年。公元373年北朝前秦攻蜀，占有益州地后，西南夷各部，纷纷归附，宁州遂为北朝苻秦所统治。到公元383年苻秦在淝水战败后，宁州复为东晋所有，朱提辖于北朝共计十二年。

公元420年东晋亡，刘裕称帝，国号“宋”，史称“刘宋”是为南朝。刘宋设宁州，领郡十五，县八十一，仍设朱提郡。

公元479年刘宋亡，肖道成称帝，国号“齐”，史称“南齐”。南齐永明五年（公元487年）置南朱提郡，领汉阳、堂狼、南秦三县，属宁州。

堂狼县这一名称，自西汉武帝建元六年起至南齐时止，其

建治约六百多年。其地域包括今会泽、巧家两县及东川市的一部古今已无异辞。近据《巧家县地名志》记载：西汉置堂狼县，治所在今巧家县属铅厂区的老唐平，但至今尚无任何出土文物发现，以资佐证，应待考。

公元589年隋文帝统一全国后，在南置昆州（今昆明）、南宁州（今曲靖）、西宁州（今四川西昌）、恭州（今昭通）四州。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年）置唐兴县地。八年，朱提改为曲州，领朱提、唐兴二县。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公元627年）采取对云南各族接近的政策。积极对各部落进行了招抚，并在其地设置了州、县，初步恢复了汉、晋王朝在云南设置郡县的规模。可是，到了唐高宗即位后，没有继续执行唐太宗的民族接近政策，对一些部落实行军事围剿，造成政治上的失利，撤销了中央设在云南的地方政权，在云南设立十六羁縻州。羁縻地区的含义是：内属正统王朝的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地方，实际管理的是少数民族上层，王朝官吏只是遥领，即名誉上臣服于正统王朝。当时在云南实行羁縻之治，实际是社会倒退，从此唐王朝无法统治云南。自唐天宝以后，云南境内，南诏兴起，公元776年建立南诏国，南诏蒙氏置东川郡，属东爨“乌蒙七部落”，即乌蒙部（昭通、鲁甸）、乌撒部（威信）、阿畔部（巧家、会泽）、芒部（镇雄）、易浪部（奕良）、易溪部（威信）、阿头部（贵州赫章）。

公元937年，以段思平为首的广大奴隶、农奴和滇东三十七部落百姓举行了大规模的起义，进军大理，攻破下关，

推翻了南诏以后的另一个政权——“大义宁国”。建立了“大理国”封建农奴制政权。

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建立了宋王朝，大理国即自动地向宋王朝表示臣属关系。但是由于宋王朝错误地总结了唐王朝覆灭的历史经验，把唐王朝的灭亡归在南诏对内地的侵扰。据《南诏野史》载：宋太祖乾德五年春（公元967年）王全斌平蜀还京师，请取云南，负地图进，太祖鉴唐王祸，以玉斧划大渡河为界曰：“此外非吾有也”。所以大理国得据云南三百多年。但当时的“乌蒙七部落”不属于大理国的范围，隶属于叙州羁縻之地。公元1253年，元世祖忽必烈“乘革囊及械”渡过金沙江到达今丽江境内，攻取了鹤庆、剑川诸部，进军大理，大理王段兴智逃到滇池地区，忽必烈班师北还，留兀良合台镇守云南，明年兀良合台受元宪宗蒙哥命，打通与四川驻军会师的通道，率兵征乌蒙（今昭通）。公元1278年（元世祖至六十五年）置乌蒙路，将元初设置的阆畔万户府，改为阆畔军民总管府。公元1297年（元成宗大德元年）增设乌蒙、乌撒宣尉司，辖乌撒路、乌蒙路，隶属云南中路行中书省，这是我区从唐天宝以后中断550年建制后新设治的开始。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属东川路地。

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属东川土府，隶云南布政使司。十六年以云南所属乌撒、乌蒙、芒部改隶四川布政使司。十七年割云南东川府隶四川布政使司，改为东川军民府地。

明王朝平定云南后，首先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进一步完

备了土司制度。这种制度是对处于农奴制、奴隶制的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的一种统治形式。但云南各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滇池地区的封建地主经济有所发展，但农奴经济在绝大部份地区仍占统治地位，特别是乌蒙、东川、芒部等地区奴隶制残余仍占很大比重。至于边远山区还保存有原始经济的因素。基于这一社会政治经济情况，乃在元代设置云南诸路行中书省的基础上，改“路”为府，更置州县。同时实行“土、流兼治”，“府、卫参设”的措施以加强对云南的统治。最终达到废除土司，改设流官，建立封建地主阶级中央集权制直接统治的地方政权。“改土归流”这一措施，从历史发展来看有它的进步意义。但在当时曾有被废弃的土司，随时组织叛乱。公元1526年（明世宗嘉靖五年）芒部改为镇雄府设流官，土司进行反叛，攻陷镇雄府城，夺去流官知府的印。这时与芒部土司有着亲属关系的乌撒、乌蒙、东川等土官“内怀不平，反者数起”，使明王朝无法收拾，因此有部份地区仍恢复了土司制度。

到了明末清初，土司制度已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废土设流，已势在必行。清康熙时云、贵、川三省要员亲赴东川，会讯禄氏（东川土府头目）及诸土酋，掀起了改流高潮，各土酋慑于清廷威势，情愿献土设流。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改土归流，东川仍隶属云南，设流官知府，仍属东川路地。禄氏对东川土府三百余年的统治到此结束，虽然禄氏迫于清廷威势而改设流官，但在土酋势力强大的情况下，仍基本维持了现状。直到雍正六年（公元1722年）以

后，改土归流又才提到清政府的议事日程上来，掀起了东川、乌蒙、镇雄的改流高潮。也是云南改流的最后一批。雍正八年秋，又暴发了东川、乌蒙、镇雄之变，史志记为“庚戌之变”，这次叛乱平息后，持续了六年之久的改土归流，才告结束。改土归流在实行土司制的羁縻地区，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政治上讲，废除土官在地方的世袭统治，改用清廷的流官来管理，使封建王朝的中央集权可以直接贯彻到改流地区。从社会经济上看，就是改变土司统治下的农奴经济为封建地主经济，也就是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社会变革。从文化上讲，归流地区，开办儒学，实行科举制。因而，改土归流是历史上具有进步意义的大事，改土归流是封建制度向奴隶制的宣战，改土归流是进步阶级战胜落后阶级的胜利，改土归流后这些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措施，都有较大的变革，满清政府一整套封建制度得到了推行，改变了土司统治时期“春风不度玉门关”的局面。

据《清史稿·地理志》载：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置会泽县于巧家汛，县城驻地“龙格”（即今巧家营）因金沙江水自禄劝入境后，纳四川会通河水，又纳小江水、以礼河水、黑水河水（即葫芦口白水河水）及牛栏江等水，所指众水汇合之意，故名会泽。翌年，因征粮不便，移治附廓，（迁移到东川府城，即今会泽县城）移府经历（经历系佐杂人员，照例不勘验命盗案件，只受理民事诉讼）分防巧家，迁东川营右，军守备分杂，均驻“龙格”。分设鲁木得（即今县城）、若那安机组、弩格、汤丹陈机租四汛，二十二塘、

六卡。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始建木城于“龙格”。十一年八月二日，因今会泽干沟发生六级地震，木城倾圮，十二年，改建土城。

清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因济运东川铜筋出省，改陆运为水运，为了防守护航，乃划四川省所属金沙江外二十一寨凉山少数民族地区归云南东川府管辖，建土城于木期古（又名蒙居租，在金沙江外，即今四川宁南县所属的新场附近距今巧家县城约三十余华里），设守备一员，把总一员，塘兵二百九十一名。

据清阮元、吴大澂、端方等人所著《金石录》收集堂狼、朱提所造铜洗共五十四件，该项铜器铸录年代最早者为汉章帝建初八年（公元83年），可见东川铜矿，在东汉以前，早已开采冶铸，驰名全国。至于当时中央统治政权，应课运云南铜筋出省，宋代以前，因缺少记载，无从查考。最早见于文字记载者有《元史·食货志》元、明宗、天历元年（公元1328年）岁课云南铜二千三百八十斤。明、世宗、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诏滇钱三千三百万串。以后东川铜矿大规模的开采，应始于清朝雍正、乾隆年间，是时亦为东川铜矿历史上的极盛时代。据清道光时所编纂的《云南通志稿》载：雍正至道光百三十余年，全省铜平均年产量在七百万斤以上，最高时达一千四百余万斤，而东川铜又占全省总产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其中只汤丹一地，即有年产五六百万斤的记录。随着全国铜的大量需要，而云南的铜筋出省，陆运或水运应走哪条路线比较方便，便成为当时最难解决的问题。先是东川铜筋，历